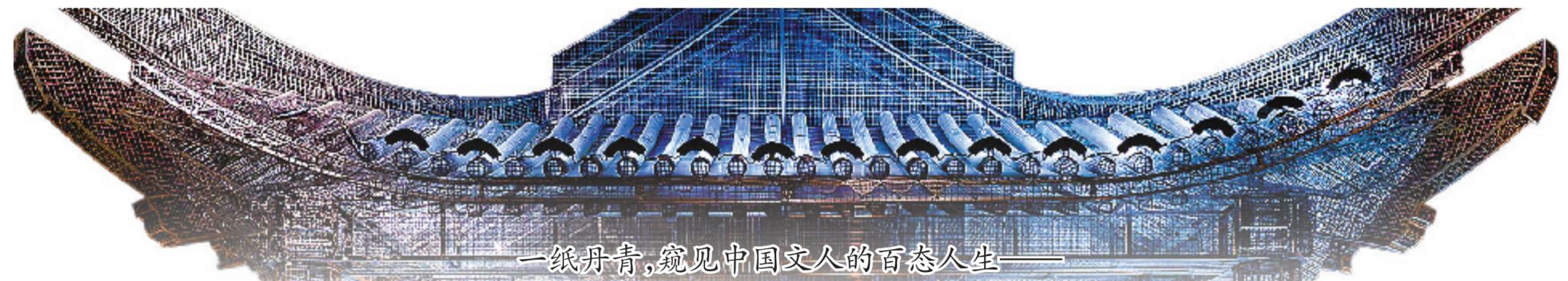


文韵周刊



——一纸丹青,窥见中国文人的百态人生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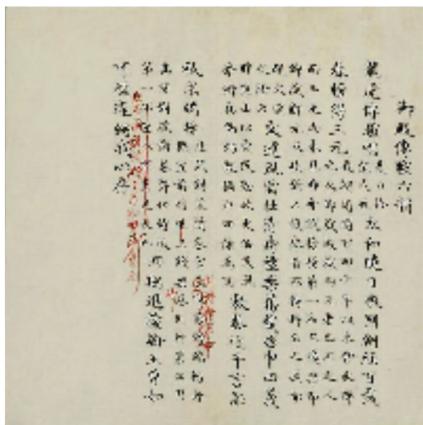
古代“学霸”的书房里,藏着什么文化密码

■ 本报记者 李娇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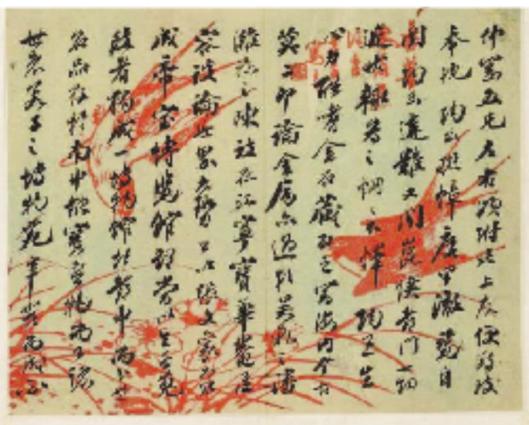
走进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的故宫厅,灯光温柔地落在近百件故宫珍藏书画上,仿佛推开了一扇时空之门。门的另一边,是古代“学霸”——中国进士们的书房。

“国子文脉——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”即将落幕。它带给观众的,不止书法与绘画艺术,更是一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百态人生。有人留下家书,絮絮叨叨叮嘱儿子“努力加餐饭”;有人俯身园中,把紫芥和黄连写成诗;还有人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接力……

“进士是科举制度下的成功者,但我们想呈现的,不只是他们‘学而优则仕’的那一面。”故宫博物院书画部书法组组长、研究员郝炎峰说,“这些文物最打动人心的地方,恰恰是让我们看到那些在历史书上的‘文化精英’,其实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喜怒哀乐。”



清人楷书写《御殿传胪六韵》诗页,此件为乾隆皇帝《御殿传胪六韵》诗的眷稿。故宫博物院提供



张翥《致瑞端北上札》。故宫博物院提供

系列沿用至今的数学术语。梁启超评价:“字字精金美玉,为千古不朽之作。”《几何原本》译成后,徐光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田野,他尝躬执耒耜之器,亲尝草本之味,在上海和天津设立农庄进行试验,引种甘薯、棉花,探索北方水稻种植的可能性。这些实践最终凝结成一部50余万字、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的《农政全书》。徐光启也因此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绕不开的名字。

为后世研究中国书画的“宝典”。此外,张照历任三朝,精通律吕、戏曲、诗文,是乾隆眼中难得的“全才”。

郝炎峰说:“这种君臣之间的情义,很少见。它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,而是‘不啻家人父子’。”

此外,明代吴宽写的《记园中草木二十首诗》卷,则体现了明代中期士大夫的生活美学。

吴宽,成化八年状元,官至礼部尚书。他写的《记园中草木二十首诗》卷,记录了自家园子里的二十种草木。

他还在诗里记录了与这些草木的互动。朱藤是他“往岁手亲插”,古槐刚开始“憔悴色不舒”,他“爱护至今日,浓阴接吾庐”。他还借草木明志:借石榴

说“我独解其缚,高枝逐其性”。

吴宽的园子,不只是一个种花种菜的地方,更是明代中期士大夫“日常美学”的缩影。明代中叶以后,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,园居成为他们安顿身心的重要方式。在园子里种花、养草、写诗、会友,既是消遣,也是修身。吴宽记录亲手插下的朱藤、悉心养护的古槐,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,恰恰体现了一种“在生活中安顿理想”的人生哲学。

正如他自己借竹子说:“因兹悟为学,笔触在斯晨”——在清晨的园中,他悟出为学之道,就是日复一日的勤勉与坚持。

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

进士们的人生各有不同,却又被同一条文脉悄然相连。

展厅里有一幅《三希堂记意图》轴,作者是董邦达,雍正十一年进士。这幅画的诞生,源于一个著名的文化故事。

故宫养心殿西暖阁是帝王召见大臣、批阅章奏的地方,旁边的小套间便是三希堂,三件晋唐书法名迹《雪霁时晴帖》《中秋帖》《伯远帖》被乾隆皇帝珍藏于此。乾隆皇帝还命董邦达创作一幅轴画来装饰三希堂。董邦达最终选取“羲之掣笔”的典故入画。

这个典故出自《晋书·王献之传》。王献之自幼学书。有一次,王羲之悄悄从背后突然抽回儿子手中的毛笔,竟未能拔出。王羲之欣喜地表示,此儿日后书法必享大名。后世以“掣笔”比喻对书法的痴迷与天赋。董邦达用此典故入画,意在传达:三希堂不仅是收藏之所,更致敬历代书家“痴于艺”的精神传统。

王羲之是“书圣”,王献之、王珣都是王氏家族成员,董邦达以王献之的少年习字的场景烘托“三希”的家族传承,巧妙地将对三件法帖串联于同一画面中。这幅画作本身,就是一次“以画证史”的实践。三希堂只有4.8平方米,大概相当于现在一间衣帽间那么大。就在这小小空间里,三件稀世名作,一幅命题绘画,共同演绎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。

中国延续数千年的“秘藏”传统,使文物免于兵火损毁。但“藏”的局限也显而易见:文化珍品与大众隔绝,无法滋养更广泛的人群。直到百余年后,光绪二十年状元、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创建南通博物院,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开始接受并实践近代意义上的“公共博物馆”理念。

这一理念源自欧洲启蒙运动,认为文物不应属于私人或皇家,而应属于全体国民;博物馆不是“藏宝阁”,而是“启智之所”。

南通博物院是我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。为了扩充馆藏,张謇不仅捐献了自己的收藏,还在社会上广泛征集文物。

“国子文脉——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”展出了一封张謇写给端绪的信。端绪的哥哥端方是清末重臣、金石书画收藏大家,曾答应以“拓本数十、陶器十数”相助南通博物院。1911年,端方意外去世。第二年,张謇写信给端绪,开列出60种金石类文物的名单,希望能够“践陶公之约”,“以永公之精神及遗爱于南中”。

这封信写得恳切,张謇的良苦用心深藏其中。他在创办南通博物院时明确提出“设为庠序学校以教,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——要把博物院变成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。从三希堂到南通博物院,从帝王私藏到公共教育,这是一场关于“文化属于谁”的观念革命。张謇那一代知识分子,用实干完成了从“秘藏”到“公器”的跨越。

那些泛黄的家书、工整的楷书、细致的小鸟,曾经是属于一个人的私密世界。如今,它们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。千年文心,在一笔一画间流淌。文脉,从来不是抽象的,它藏在打动人的细节里,等待着被看见,被理解,被传承。

延伸阅读

成语里的科举故事

■ 本报记者 李娇伊

科举时代虽已远去,却在我们的语言体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那些耳熟能详的成语背后,藏着一个个古代读书人的悲喜人生。

走马观花

“走马观花”指骑在奔跑的马上看花,形容粗略地观察。这个成语出自唐代诗人孟郊的《登科后》: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

孟郊一生坎坷,早年隐居山林,在母亲的勉励下赴京赶考。第一次落第,第二次又落第,直到第三次才终于榜上有名。那年他已46岁。登科后的喜悦,让这位年近半百的老考生忍不住策马长安街头,写下了这首千古名句。后人从中提炼出“走马观花”,原意是形容事情如意、心境愉快,后来才引申为粗略观察。

蟾宫折桂

“蟾宫折桂”指在月宫折取桂枝,比喻科举高中。这个成语的源头,可以追溯到西晋名士郗鉴。

《晋书·郗鉴传》记载,晋武帝有一次问郗鉴:“你觉得自己怎么样?”郗鉴毫不谦虚地回答:“就像月宫里的一枝桂枝,昆仑山上的一块宝玉。”这种近乎“凡尔赛”的自信,不仅没让晋武帝生气,反而对他大为欣赏。从此,“蟾宫折桂”就成了学霸们“秀”成绩的经典表达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,在给友人的诗中写道:“折桂一枝先许我,穿杨三叶尽惊人。”

独占鳌头

“独占鳌头”指占据首位,特指科举考试中夺得状元。这个成语的出处,与古代殿试的仪式有关。

北宋《事物纪原》记载,皇宫大殿前的石阶上雕有鳌鱼,殿试结束后,状元要站在鳌鱼头上,等待唱名。所谓“鳌头”,就是石阶上那个雕着鳌鱼的位置。站在这里的人,便是科举时代的佼佼者。元代无名氏在《陈州米集》中写道:“殿前曾献升平策,独占鳌头第一名。”一个位置,成就了一个成语。

桂林杏苑

“桂林杏苑”是一个相对冷僻却意蕴深长的成语,专指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和会试。古时乡试在农历八月举行,正值桂花开放,考中者称“折桂”;会试在农历三月举行,正值杏花绽放,考中者称“探杏”。

清代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中写道:“桂林杏苑,空成魂梦之游;虎斗龙争,又见征战之事。”草木开花结果的自然时序,与读书人的功名之路巧妙地契合,时光里藏着多少寒窗苦读的期待。

沆瀣一气

“沆瀣一气”如今多指臭味相投的人勾结在一起,但它最初的故事,却与一场科举有关。

据北宋钱易《南部新书·戊集》记载,唐僖宗乾符二年(875年),科考主考官名叫崔沆。放榜时,考生们发现一个叫崔沆的人赫然在列。

“沆瀣”二字,本意是指夜间的水气、雾露。爱凑趣的人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编成一句话:“座主门生,沆瀣一气。”意思是,他们师生两人像是夜间的水气、雾露连在一起。后来,“沆瀣一气”从一句玩笑话渐渐变成了一个含贬义的成语。

43岁才中进士,晚吗

两页薄纸,字迹潦草,像是随手记下的草稿。这是乾隆皇帝御笔写的《御殿传胪六韵》诗稿。正是这两页纸,还原了中国科举史上一个“超级学霸”的诞生。

乾隆四十六年(1781年)的一个春日,169名考生端坐在紫禁城保和殿里,迎接决定命运的殿试。两天后,阅卷官拟出名次,前十名的卷子呈送御览。按惯例,皇帝很少改动名次——毕竟能进前十,水平相差无几,读卷官通常把“书写端楷”的放在前面。

没想到,乾隆皇帝认真读完十份卷子,把第四名提到了第一名。拆开弥封一看,这名考生叫钱棨,再一查——他竟然是会元和解元了!清朝第一位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皆第一的“三元”就此诞生。在宣布名次的传胪大典当日,乾隆皇帝在《御殿传胪六韵》中高兴地写道:“国朝经百载,春榜得三元。”

钱棨出自书香世家,先祖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。自唐至清,科举史一千三百多年,连中三元的只有十三人,平均百年才出一个。他能成为其中之一,靠的是实力,也带着点运气。

但命运的笔,并未就此停止。高中状元后,钱棨被授翰林院修撰,入值上书房,担任皇子教师。看似前程似锦,却在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卷入一场科场舞弊案——不是他舞弊,而是他担任乡试主考官时,下属失职,他因失察之罪被革职留任。后来,钱棨又在另一场考试中“阅卷疏忽”,被彻底罢官,从巅峰跌入谷底。直到嘉庆帝即位,他才被重新起用,但人生最黄金的十年,已在仕途的波折中耗尽。

数据显示,展览中涉及的历朝历代进士登科年龄,从18岁到55岁皆有。人到中年才考中进士,晚吗?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给出了自己的人生答案。

他43岁才考中,这个年纪在明代已经可以自称“老朽”。如果徐光启活到今天,简历投出去,第一轮就可能因年龄被筛掉。但历史证明,真正的价值从不因时间而褪色。

考中进士的两年后,45岁的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《几何原本》前六卷。他将“geometry”译为“几何”,创造性地确定了点、线、面、直角、锐角、钝角、平行线、对角线等一

父亲、知己、“生活家”

“国子文脉——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”中藏着许多小故事,展现了古代进士们在家国情怀之外的烟火日常。

《行书家书》卷,是被誉为“天下第一清廉”的进士陆陇其写给16岁小儿子陆震微的四封信。陆陇其告诉儿子,读书不是为了空谈,而是为了“身体力行”。他还在信里叮嘱:“日间饮食,不可太少”“努力加餐饭”“汝须要一心读书,不可作辍”。在一位父亲心中,所有关于圣学学问的叮嘱,到最后都化为一句“好好吃饭”。

如果说陆陇其的家书让我们看到了进士作为“父亲”的一面,那乾隆皇帝在张照《行书读昌黎集诗》轴上写的一段题跋,则是一段独特友情的见证。

张照,康熙四十八年进士,19岁高中,堪称神童。乾隆十年正月,张照在奔父丧途中病逝,年仅55岁。三十年后,乾隆皇帝在张照的旧作上题写了一首诗,专门怀念他:“法书老翰正兼奇,旧集频翻运笔为。所作自惭弗称字,今差称矣彼亡之。”大意是:以前我写得不好,你们都不说,我自己知道;现在我写得好了,可你已经看不到了。

这幅作品上,钤着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“八徵耄念之宝”“太上皇帝之宝”三方大印——说明乾隆在人生的重要节点,都会把这件作品拿出来看看,盖上当时的印。从登基到成为太上皇,这份怀念贯穿了他的一生。

张照是乾隆皇帝艺术上的“知己”与“影子”。他的书法取法自颜真卿、米芾和董其昌,形成丰腴流美的独特风格,恰好契合了乾隆皇帝追求的“盛世气象”,被其称为“羲之后一人”。张照更是乾隆皇帝文化事业上得力的参谋。他主持编纂《秘殿珠林石渠宝笈》,系统构建了清内府的书画收藏体系,成



董邦达《三希堂记意图》轴 故宫博物院提供



“国子文脉——历代进士文化艺术展”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故宫厅展出。图源视觉中国